

美蘇對「和解」觀念的歧異

尹慶耀

法語「détente」一詞，原表示緊張關係或緊張狀態的緩和或鬆弛，意譯為「和解」不妥，用以代替「和平」更加不妥。

「和解」用作外交術語，過去受到稱讚，而今受到責難。「和解」外交的高潮期，美蘇首腦建立了定期會晤制；「和解」外交陷入低潮，美蘇首腦在一九七五年不曾定期會晤。福特總統且曾聲明要拋棄「和解」一詞，今後不再使用。

「和解」所以如此迅速跌價，是由於不少美國人士認為，那是一條只對蘇聯有利的單行道。但更根本的原因，或許是由於美蘇雙方對於「和解」一詞的理解，有着根本的差異所致。

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應邀在華盛頓舉行的「全球和平大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主權國家的爭端，祇有用談判或用力量，用折衷或用強制手段去解決。至於那種辦法行得通，那就要視各有關國家的價值標準、力量 and 內部制度而定。一個國家的價值標準，決定什麼才是公正；其力量決定何者可為；其內部結構決定何種政策實際可以實行和維持」①。

就某種意義說，這些原則可通用於自由和共產兩個世界。不過，二者價值標準之不同，想來是沒有人會加以否定的。如果自由國家的價值標準，是與其立國精神與文化背景有關，那麼共產國家的價值標準，也以其立國精神和意識形態為依據，是不足為奇的。然而，講原則雖然相同，論實際可就謬以千里了。

美蘇對「和解」觀念的歧異

西方民主國家尊重個人自由，容許不同的政黨與反對意見存在，連帶着它們即使堅決反對共產主義，但也沒想到共產國家去摧毀共產制度。尼克森從未忽視美國和蘇聯及中共之間的分歧，季辛吉說：「本屆政府對於蘇聯的制度從未抱有任何幻想」②。美國參議院民主黨副領袖白爾德（Robert C. Byrd）參議員說：「和解并非是要我們接受蘇聯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或價值標準，或是贊同它的政府形式」③。類此的說法，在美國政壇或輿論界中，幾乎可說俯拾即是，但很少看到有誰主張摧毀蘇聯以及中共的意識形態或政府制度。季辛吉且曾說過：「……對自由與暴政之間由來已久的敵對問題，我們并非漠不關心。但其他迫切的問題使我們的能力受到限制，而無法促成外國內部的改變」④。這是說，美國即使想那樣做也無此力量。因此，美國的「和解」，確係緩和緊張、達成「共存」的方式或手段，并不含有其他意義。

共產國家的價值標準不同，它們的國家具有階級性，要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去依照馬列圖式改造世界，那就必須把一切非無產階級國家埋葬。

在列寧心目中，「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共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毀滅」⑤。共產國家的目標，就是毀滅自由制度。

人們或許要問，赫魯雪夫時代不是已經宣稱，蘇聯已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全民國家」了嗎？我們得說，口號始自赫魯雪夫，理論內容却偷自史達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史達林在全蘇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題為「論蘇聯憲法草案」，他宣稱蘇聯「社會中已經沒有了彼此對抗的階級」⑥。但是他不想讓國家（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依照馬、恩學說，隨着

階級的消亡而消亡。赫魯雪夫宣稱蘇聯成爲「全民國家」，讓無產階級專政（宣傳上）先消亡，讓國家慢一點消亡，正是同一手法。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史達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把國家職能分爲三個，第一個職能是鎮壓國內已被推翻的階級；第二個職能是保衛國家以防外來的侵犯；第三個職能是進行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他當時就讓第一個職能消亡了，國家「只」有第二、三個職能。至於蘇聯這個國家，即使到達共產主義時期，如果「資本主義包圍尚未消滅」，還沒有「被社會主義包圍所替代了的話」（意即周圍都成爲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國家」還是要存在的⑦。

赫魯雪夫的「全民國家」，是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中提出的。同月三十一日通過的蘇共新綱領中說：「由於剝削階級被消滅了，鎮壓它們反抗的職能也就消失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職能，即經濟組織和文化教育的職能得到了全面的發展」。此外，新綱領特列「蘇聯武裝力量 and 國防能力的加強」一章，以充實史達林所稱的國家的第二機能。赫魯雪夫在「關於蘇聯共產黨綱領草案的報告」中，雖則聲稱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變成了「全民國家」，但是，那「只有在蘇聯建成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在國際舞台上取得勝利和得到鞏固以後，國家才會失去必要性，它才會消亡」。換言之，赫魯雪夫的全民國家，仍然肩負着在世界上推展「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任務。而且，蘇聯的現領導人，在這方面並無若何改變。直到一九七六年二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向蘇共第二十五次大會提出的「總結報告」中，提到即將交付全民討論的蘇聯新憲法草案，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確立蘇聯國家「階級本質」的社會主義制度共同原則。就蘇聯領導者來說，全民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其實是二而一的東西。

如此說來，美國和蘇聯就不止是兩個主權國家，從蘇聯立場來看，那代表着兩個國際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就我們的立場而言，那代表着兩種制度（自由制度與共產制度）。惟其如此，美國所追求的是各國人民能自由選擇其政府的形式，蘇聯所追求的是在全世界推廣其共產制度，二者本來就有些攻守異趣。如果在「和解」政策下，使人覺得美國維持自由制度的勇氣，遠遜於蘇聯推行共產主義的決心，那是相當危險的！

一一

回溯一九六九年一月，當尼克森倡言「以談判代替對抗」時，「和解」外交，實際上即已開始。促成這項外交的因素，或許就是季辛吉所說：「如何以有限的實力來完成經過縝密確定的目標」⑧。這是說，美國已感覺到它的實力不是無限的，它必須對它的國家目標加以選擇、確定，並以「和解」政策作爲達成這些目標的手段或策略。

根據當時的判斷，蘇聯大概同樣有此需要。若果如此，美蘇之間就會有「共同」利益。這項假定是建立在下述事實上：由於中蘇共黨的分裂，東西兩大陣營界限模糊；西歐及日本經濟力量強大，新興國家紛紛成立，世界由兩極走向多元；美蘇既不能分領自由與共產兩個世界，而彼此的核武器又接近勢均力敵，因此緩和緊張、避免在衝突中同歸於盡，就成爲絕對必要。這些既然確屬事實，那麼「和解」政策的設計，也就不能說毫無根據。儘管如此，「可是基本的問題仍然未變，那就是雙方所認識的和解程度，究竟有着多少距離呢？」⑨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主持歐洲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赫特曼（Arthur Hartman）告訴美國眾議院議員們說：「我們（美國）不會放棄我們的基本原則」。他并明白指出「和解」只是達成最終目標——「防止核子戰爭」在實際上所必須採取的一種策略⑩。

避免核戰也是蘇聯搞「和平共處」的主要動機。而且從赫魯雪夫時代，中蘇共黨就爲核戰理論發生爭吵。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莫斯科世界共黨會議中講過假如核戰爆發，世界上「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的話。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日，中共「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一文，聲言如果帝國主義發動戰爭，最後「勝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蘇共不同意這種狂妄理論，「他們說，『原子彈不遵循階級原則』，『原子彈是不會辨別帝國主義者在什麼地方，而勞動人民又在什麼地方的，它轟擊成片的的地方，所以消滅一個壟斷資本家，就會消滅數以百萬計的工人』

。「蘇共領導人認為，『任何一個小小的「局部戰爭」都會成爲引起世界大戰的火災的星星之火』；『現今，任何戰爭，即使由普通戰爭、非核戰爭開始，也會變成毀滅的火箭——核戰爭』。這樣，我們將會毀滅自己的諾亞方舟——地球」。「赫魯雪夫說過：『……至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不設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廢墟上、在荒無人迹的和被熱核塵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產主義的文明。我們尚且不談，對許多人來說，社會主義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了，因爲他們的肉體已經從我們的地球上消失了』^⑩。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蘇聯確係有意避免核戰爭。不過，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的蘇共理論雜誌「共產黨人」上，揭載了赫魯雪夫的一次演說。他把戰爭分爲：（一）全面戰爭；（二）局部戰爭；（三）民族解放戰爭等三種。他認爲全面戰爭以及隨時有擴大成爲全面核戰的局部戰爭，都要極力避免，對於民族解放戰爭則要全力支持。換言之，他要避免全面戰爭，而不是全面避免戰爭。

布、柯政權比之赫魯雪夫，其支持民族解放戰爭更爲積極，但這與「和平共處」政策不是相悖，而是相輔相成。一九六六年一月在哈瓦那舉行第一屆亞、非、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時，一位代表發言稱：「有了蘇聯的和平政策，就可以束縛住帝國主義的手腳，許多地方的解放鬥爭就可以在蘇聯的幫助下取得勝利」^⑪。這正是蘇聯「和平共處」政策的目的之一。

季辛吉說：「和解不能掩飾在任何地區的不負責任行動，包括中東地區在內」^⑫。然而他的警告不會發生重大效果，而蘇聯的勢力正伸向中南半島、安哥拉……。布里茲涅夫且悍然宣布：蘇聯共產黨永遠支持那些爲自由而戰的民族^⑬。這裏的所謂「自由」，當然是根據蘇聯的解釋。這表示，蘇聯和美國面對面的和平共處，不能妨礙它在其他地區支援民族解放運動。用篇首所引季辛吉的話來說，蘇聯對美國的關係用「談判」，對其他地區尤其是民族解放地區則用「力量」。

布、柯政權解釋：「和平共處是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不但不排擠、而且爲解放鬥爭、人民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創造最有利的條件」

美蘇對「和解」觀念的歧異

。「和平共處并不意味着衝突結束，而是意味着繼續發動衝突。并不意味着放棄革命，而是意味着繼續革命」^⑭。這些話是有所指的。

赫魯雪夫曾經說：「在現代條件下，和平共處政策具有特殊意義。當世界上只有一個被帝國主義四面八方包圍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和平共處政策的目的是贏得時間，取得喘息機會，以便鞏固我國（蘇聯）的無產階級政權社會主義建設。現在，由於戰爭性質的改變和世界舞台力量的新對比有利於和平和社會主義力量，和平共處政策具有遠爲重大的目的和任務，並在實質上補充著新內容。和平共處政策的最終目的，是爲了在和平經濟競賽中爲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提供有利的條件」^⑮。

近年來，蘇共不斷宣傳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民族主義的力量爲三大革命力量，共產集團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運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殖民主義體系的民族解放運動爲三大革命浪潮。和平共處的任務，就在掩護共產集團的建設以提高其經濟與軍事力量，但它同時却以其力量去支持工人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去削弱資本主義陣營，這樣就爲戰勝資本主義的革命，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蘇聯的這項理論，經已爲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第三次世共會議通過的基本文件「現階段反帝鬥爭的任務和共產黨、工人黨、一切反帝力量的聯合行動」所採納，也就成爲它們聯合行動的原則。

一九七六年二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蘇共二十五次大會的總結報告中，一則說，「爲確立和平共處原則，鞏固和平、削弱戰爭爆發的危險性而奮鬥，乃是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政策中最主要的事」。他把這些原則限制於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中。要認清人民革命、民族解放運動並非與國間的關係。布里茲涅夫再則說：「緩和與和平共處關係着國與國間的關係，這特別意味着，國與國間的糾紛、衝突，不應以戰爭的方式來解決」。這是他和平共處的具體內容，粗看起來，這和美國所謂爲歧見談判不爲歧見對抗的說法，是大致相彷彿的。布里茲涅夫接着說：「緩和不會廢除、或改變階級鬥爭的法則。任何人都不能認爲共產黨人在緩和的情形下，會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妥協」。粗看起來，這和美國同蘇聯來往，并非接受後者的意識形態，同意其政府形式，原則還是一致的。可是，布里茲涅夫還多一個不妥協的階級鬥爭，這鬥爭或許是由第三者來進行，那就和美國有天淵之別了。

蘇聯的經濟競賽口號，近來有時還叫嚷一兩聲，但是越來越不響了。在競賽過程中，蘇聯發現自己的經濟制度或經濟結構缺乏效率，於是就提倡經濟改革。改革效果不彰，就想引進西方的資金與現代化科學技術，來補自己之不足。於是，這又成爲蘇聯和平共處的新內容、新任務。因此，布里茲涅夫在上引報告中說：「國際氣氛正常化，爲經濟、科技、文化合作的繁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些交流或合作，裝進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底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寫進了八月一日發表的赫爾辛基宣言。但蘇聯對經濟、科技合作異常積極，對文化交流却多方阻撓。布里茲涅夫在上述報告中又特別指出：在兩個世界觀的鬥爭中，決不能採取中立與妥協的立場，對於敵視的意識形態的暗中破壞行爲，要「及時予以反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克里姆林宮舉行列寧誕辰一〇六週年紀念，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演說時，對西方指責蘇聯在安哥拉等問題上破壞緊張緩和原則提出反擊，聲言蘇聯絕不承認在思想意識方面可以和平共處，並堅決地繼續加強其與抵抗殖民支配和剝削的各國人民之間的團結^⑳。

綜合同上述種種，布里茲涅夫就在他的總結報告中說：「緩和可爲和平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這證實：社會主義與和平是不可分的」。可見，他所要求的緩和、和平，就是有利於蘇聯及其集團的單行道。

四

蘇聯的所謂「和平」，是一種鬥爭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充其量只能像尼克森所說的，是一種政策轉變。而這種轉變，「祇是改頭換面，而非回心轉意。這是一種肯定舊時所用戰術不能成功的一項合理而適當的估計」。他知道「蘇聯和中共并未放棄它們各自對世界的看法」。他之所以努力「在國際間達成一組協議、諒解和慣例」，就是要「使那些尋求改變現狀的人，只能用和平方法來達到目的」。顯然，他沒有把握讓蘇聯和中共放棄它們改變現狀的目的，而只想設法限制它的武力擴張。他曾經由那些協議、諒解和慣例，構架一種「穩定而和睦的國際秩序」，這樣就「是建立一座有效的——而且可以持久的——和平結構」^㉑。他的構想，仍然是以維持現狀爲基

礎的和平，這種和平就是目的，就是終點站。

共黨的和平共處另有所圖，就連中共也認爲「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共處政策，有利於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有利於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有利於孤立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勢力」。它并非根本反對和平共處，它祇是反對「把和平共處作爲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㉒。其實，蘇聯從來未曾忘記在和平共處的同時，大力支持其他地區的「革命」或「解放」運動。共黨的和平共處絕不是終點站，而是中途站。你既不能強迫共黨放棄它對世界的看法，你就沒法把它束縛在現狀上。世界上原本不會有只願維持現狀的革命者，何況共黨是要把現有制度一概推翻，重新照馬列主義的圖式來改造世界呢？

季辛吉說，當前的世界環境既助長安定又使之難以保持。現在競求平衡不應與過去的勢力均衡相比。更明確地說，是不能與十九世紀的情勢相比。他認爲當時各主要國家同有根本上相似的法性概念，而且大家接受既有的國際秩序的基本結構。勢力的小小調整就很重要。「均衡」在一個相當狹窄的地理區域中發生作用。但這些因素現在都不行了。因此他說，我們講平衡也不是指無目標的單純機械的模式。幾百年來維持平衡而經常變動的聯盟，在目前既不相宜也不可能。「在一個意識形態分立的時代中，敵友之分是客觀的現實」^㉓。

儘管如此，季辛吉之受有十九世紀均勢外交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美國之拉攏中共，除了制衡蘇聯外，再找不出更好的解釋。在美國「和解」政策影響下，若干自由國家也紛紛在追求均勢，實行「等距離」，外交，這就有着遺忘我們是處「在一個意識形態分立的時代中」的傾向。講求量變質變的共黨，是不容許有均勢和等距離存在的。在「意識形態分立」的狀態下，用我們自己的一般概念和價值判斷去推論敵人，是極其容易錯誤的。

季辛吉說，我們的眼前目標是建立一個安定的關係網，希望人類莫再受戰爭的折磨。這話是不錯的。但如果這個關係網，只限於大國之間，幾個主要勢力的均衡，必然使得中小國家不滿，而授共黨以煽動利用之機。如果偏重純軍事主義，只求在軍事力量（包括技術）方面領先，而忽略政治戰、心理戰，那就恰巧使共黨可發揮其所長。如果只注意避免正面衝突，而容許共黨迂迴作戰以及從事內部顛覆，那仍然將是自由世界致命的弱點。

美國要保持領先世界的強大的軍事力量，原本是「和解」外交的主要支柱。尼克森、福特、季辛吉乃至其他的軍事領袖，從未忽視此點，但在「和解」政策所造成的「和平」假象下，軍事預算就不易通過。於是就正如美國陸軍部長霍夫曼所說，自從越戰開始以來，蘇聯每年增加國防經費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而美國在此期間，却以同樣比率削減其國防經費^②。現今美國似已有覺悟現象，但至少過去那些時間是白白浪費了。

輿論尤其是國會對於政府外交權的干預，有時會使美國背信負義，在敵人面前束手無策。這樣是不容易搞好「夥伴關係」的。其影響之深鉅，就不可以道理計。這讓我們想起篇首所引季辛吉的話，以國家的內部結構言，民主政體是最不適於權術外交的，雖然它在其他方面有着數不盡的優點。

五

「和解」外交曾經喧騰一時，然而，且不管美蘇間的限武談判和糧食協定等，美國是否吃了虧。但孟加拉之戰、第四次以阿戰爭、中南半島的淪亡、安哥拉的赤化，都是在「和解」時期出現的。現今，人們既有理由用白爾德參議員的口吻問：「我們在（和解）這方面是不是進行得太過份、太快，而且太信任對方」^③？他本人在講這話時是贊成「和解」的，目前他也轉到反面去了。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福特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中宣稱：「和解」一詞，已不適用於美國對蘇聯和中共的關係，他提出「以實力謀求和平」的口號，以代替過去的「低盪」。五月十二日，福特又延期和蘇聯簽署一項主要禁止核試的儀式，這儀式原安排好於十三日在華盛頓和莫斯科兩地同時舉行^④。另外，在競選活動轉趨激烈時，季辛吉也三緘其口，不談外交政策，以免影響福特競選。

不過於福特總統聲明放棄使用「和解」一詞後，蘇聯曾譏之為「大選年的把戲」。三月十四日「真理報」一方面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本質沒有改變，一方面又說：「這項（不再使用「低盪」一詞的）聲明，立刻被反對國際局勢進一步正常化的人士利用，藉以發起一項叫囂運動，目的是想美國修正對蘇聯的政策基礎」。在蘇聯本身，依然要實行這個對它有利無害的「和解

」。葛羅米柯訪法，其目的在此。季斯卡繼之訪問美國，或許只是時間上的巧合。不過，季辛吉於五月二十日出席北約外長會議時表示，不論誰贏得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對蘇聯的和解將不會有代替的途徑^⑤。

美國的和解政策，看來是不易改變的，只是在執行過程中，或許會變得謹慎些。至於蘇聯，它仍然會遵守列寧的遺訓：「和平是爲了準備戰爭的一種暫息方式」^⑥。美國能改變蘇聯這種基本觀念嗎？

註釋①見一九七四年一月號「今日世界」馬孔股節譯文，標題爲「憑合作與諒解促進世界和平」。

② 同右。

③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白爾德在參議院演說。同年六月號「今日世界」發表溫能坤譯文，標題爲「和解：還有選擇的餘地嗎」？

④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季辛吉向參議院外委會所提主要外交政策報告

⑤ 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所作「俄共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

⑥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史達林「論蘇聯憲法草案」，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史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本，六八一頁。

⑦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史達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列寧主義問題」，七九三頁。

⑧ 「憑合作與諒解促進世界和平」。

⑨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五日赫特曼向衆議院所作書面聲明。參閱同年七月號「今日世界」修信節譯文，標題爲「東西雙方爲什麼要和解」。

⑩ 同右。

⑪ 以上「號內文字，俱轉引自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報」刊載中共「政府發言人聲明——評蘇聯政府八月二十一日之聲明」。

⑫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載同月十七日「新華社」通訊。

⑬ 「憑合作與諒解促進世界和平」。當時尚無安哥拉問題。

⑭ 一九七六年二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蘇共二十五次大會中的報告。

⑮ 一九六九年一月廿九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中國的對外政策」第九篇。

⑩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赫魯雪夫在東德統一社會黨(共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演說。

⑪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三日日本「每日新聞」夕刊第一面。

⑫以上所引，俱見尼克森作「通往和平的真正道路」。此文着手寫作於一九七二年他訪問北平之前，從北平返美後再加推敲修正，並於莫斯科高峯會議前再一次增減潤色，始發表於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⑬以上所引，俱見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刊載「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

來信的復信」。

⑭見「憑合作與諒解促進世界和平」。

⑮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央社懷俄明州斜陽「美聯社」電，見十七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⑯見「和解：還有選擇的餘地嗎」？

⑰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美聯社華盛頓電。

⑱同月二十日「合衆國際社」奧斯陸電，見廿一日中華日報第二版。

⑲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寧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所作「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

美國多國公司的發展與前途

陳元

前言

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又被簡稱作“Multinational”，已經成爲國際關係中新的重要角色，但是還沒有公認的定義，最簡單的定義是，一個公司而擁有兩個以上在國外的分公司，不論是從事生產的或提供勞務的。大多數專家認爲，必須一個公司在國外設有六個以上的分支機構，而每年銷售總數在十億以上的，纔可以叫做多國公司。聯合國的研究指出，「多國公司的年銷售量在一億美元以下的，可以很穩妥的不必加以重視。」世界上現在只有二百家以上的多國公司，年銷售額在十億美元以上，它們的活動才受到普遍的重視。此外，聯合國所成立的研究小組指出，「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並不能確切作爲這種企業的命名，較爲確切的名稱是「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因爲這種公司並不都是股份有限公司，有些是政府企業、個人企業或合作社。①

本文不在定義上作研討，只是要說明，所研究對象是在國際間能發揮影響力的多國企業。

今天世界上的多國公司，總公司不完全在美國。幸福雜誌每年發表美國五百家最大工業公司名錄，一九七五年五百家的總銷售額是八三三、九五六、六九九、〇〇〇美元。另外又公佈一九七四年美國以外世界三百家最大工業公司，銷售總額是六七一、六二三、五八一、〇〇〇美元。幸福雜誌又把一九七四年美國和美國以外五十個最大公司，依銷售額多寡的次序排列起來，最大是美國埃克森汽油公司，年銷售額是四二、〇六一、三三六、〇〇〇美元。列名最後的是巴西的巴西石油公司，年銷售額是四、九八九、七四〇、〇〇〇美元。五十個公司的銷售總額是五三八、五九二、六六九、〇〇〇美元。五十個最大公司之中，有二十四個的總公司在美國。美國二十四個公司佔五十個公司總銷售量的五七%，資產佔五三%，雇用人數佔五二%，淨所得的六八%。②

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美國的多國公司的單位和實力都佔世界總數的半